

## 三部文集：20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文学进程中的三个里程碑

杨 正

(南京大学, 南京 210023)

**提 要：**本文通过对《文学莫斯科》、《塔鲁萨书页》、《大都会》三部等文集及其各自命运的介绍来管窥20世纪后半期苏联非官方文学由“地下”走到“地面”，“隐性”成为主流的“解冻”之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需要不断面对和克服来自苏联意识形态机器及文学审查制度设置的各种障碍。三部文集的命运向我们诉说了这条道路的艰辛，展示了编者作家们不畏强权、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良知。它们创作与结集过程还颠覆了斯大林规定的苏联统一作家协会的理念，使共同的政治、社会、审美情趣等应当成为作家自由结合的基础这一思想日渐深入作家们的心灵，这一思想也为日后的，即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学团体、文学杂志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许多文集的作者后来成为俄罗斯文学的精英。可以说，这三部文集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文学史上三座里程碑。

**关键词：**《文学莫斯科》；《塔鲁萨书页》；《大都会》；非官方文学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 1 引言

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给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下的苏联文学带来了少有的“喘息”机会。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开展了清除个人迷信的工作，文学界也出现了反对行政干预，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一年后作家爱伦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1954），这部作品成了后来所称的“解冻”文学的先驱。“解冻”是俄国冬末春初的一种气候现象，即李清照所说的“最难将息”的“乍暖还寒”时候。因为“解冻”必然伴随着寒潮和春寒。这种自然现象成了历史过渡期的一种比喻。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内容公开以后，社会意识中出现了变革在即的预感，苏联社会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化、新思潮充满期待。关于这一时期，曾任《新世界》杂志第一副主编的作家弗·拉克申深有体会：“原来习惯于缓慢扭扭转动的历史车轮，忽然转了我们尚能看清的一圈，之后加速前进，闪烁着辐条，把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卷入了不可避免的运动，变革——生活”（20世纪俄罗斯文学 2001：482）。从斯大林逝世到二十大召开的这段时间，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发表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创作方法上逐渐打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一言堂的垄断局面，开始呈现多样化倾向。以此为契机，俄罗斯文学逐渐走上了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的漫长道路<sup>1</sup>。

解冻初期，官方旧有的文学观念和教条仍非常顽固。以“无冲突论”、“粉饰现实”为主要特征的小说仍然是官方文学的主流。官方文艺理论家还在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以致《解冻》、《不单是靠面包》及后来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作品都分别经历了“发表——赞扬——受批判”的相同厄运。由此可见，20

世纪后半期的苏联文学的“解冻”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条历经近40年（1956—1992）的漫长之路。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这是一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苏联时期一直匍匐走过的道路，沿途不仅要穿过布满荆棘的外部审查，而且还要穿透苏维埃体制自身的雾霭”（Солженицын 2003：55）。在这一文学进程中，为数众多的文学杂志和文学作品集（以下简称文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些期刊和文集及时、生动地反映了社会新风气和新潮流。一批诚实的作家有意识地组织文学队伍，对抗官方作协机构及其奉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们大胆刊登与意识形态无关、审美情趣和艺术性不俗的作品。自“解冻”之时起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地下文学”作为一种存在形式一直与官方意识形态推崇的所谓主流文学相抗衡，它们传播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自出版物”和“国外出版物”。用俄罗斯学者伊·库库林的话来说，正是这种“不受审查控制的文学积聚了巨大的潜能，它有助于形成自由的、‘个别的’，但却有着完善审美功能的成熟的世界观”（转引自Чупринин 2007：513）。本文拟以20世纪后半叶由一批作家自行出版的三部文集的命运为例来管窥这一阶段苏联非官方文学逐渐由“解冻”到“解放”的过程。

## 2 《文学莫斯科》（1956）

作家维·卡维林的儿子尼·卡维林在回忆自己的父亲一文中提到：“1955年这一年，作家被赋予自行编纂和出版文学作品集的权利，如此特殊的待遇自20年代起就从未碰到过”（Каверин 2002：11）。《文学莫斯科》（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осква）文集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文集编委会完全属于自发组建的非官方组织。文集的主编是作家艾·卡扎凯维奇，编委会成员还有玛·阿利戈尔、亚·别克、维·卡维林、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弗·田德里亚科夫等。1956年1月文集的第一辑面世，继而在同年的11月又成功推出第二辑。诗歌方面，文集收录了尼·扎博洛茨基和著名女诗人玛利亚·茨维塔耶娃的几首诗歌。两位诗人长期以来都被官方禁止，作品得不到发表，这也标志着他们重新“回归”文坛。此外还选登了托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中无法在官方刊物发表的两章。小说方面，收录了格罗斯曼、普里什文、田德里亚科夫等人的作品。除文学作品外，文集还收录有论文、札记等，比如玛·谢格罗夫的《论当代戏剧中的现实主义》和莉·丘科夫斯卡娅的《业务谈话（文学作品校订工作札记）》。

文集的第一辑刚出版便遭到了“官方文学”的批评和指责。一方面，作家们这种“肆意妄为”绕开官方文学审查的做法被视为极为危险的自由主义，开创了非常糟糕的先例。加上该文集在苏联国外获得了不少的正面评价，这更加刺激了文学官僚们的脆弱神经。另一方面，部分文学界“同僚”的嫉妒心作祟，似乎这种做法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挑战，因而气急败坏地甘做攻击该文集的急先锋。待到第二辑问世后更是受到批评界的严厉谴责。攻击的焦点集中在作家亚力山大·亚申的短篇小说《杠杆》，认为这是对苏联现实的歪曲和“污蔑”。小说中描写了被乔治·奥威尔称作“双重思想”的社会现象。作品公开揭露了集体农庄生活的种种丑态，异常鲜明地指出这种生活方式的虚伪本质。这自然惹怒了那些“老大哥”。实际上，文集第二辑受到激烈批评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与第一辑出版的1956年初相比，此时的社会氛围变得更加严峻。该年发生了著名的匈牙利十月事件。虽然最终在苏联坦克的介入下事件得以平息，然而苏联领导人明白，这次事件中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此时苏联社会已经出现“解冻”的征兆，但并没有放弃、也不可能放弃对文学的控制。官方对文学界广泛讨论苏联文学审查制度和抱怨当局过分干预文学活动十分不悦。曾担任过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费定就曾表达过类似的不满：“以前我们过过一段好日子，那时一个编辑手上有20—30个作者，而如今一个作者面对的是10个编辑和10个从其他协助机关派来的人员。这些编辑中还出现了希望靠受贿和攫取所校订作品的稿酬而发横财的人”（Горяева 2009：326）。为此，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上接连发表了三篇社论，斥责在知识分子中出现的“错误思想倾向”，同时也批评了《文学莫斯科》文集。在

第二辑出版以后，苏联作协召开会议，会上严厉批评了文集中表现出的“虚无主义、修正主义和小集团主义”（Казакевич）。

这时期发生的著名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足以说明官方坚决控制文学创作的决心。本来准备将长篇《日瓦戈医生》交由《文学莫斯科》文集发表，可就在这时官方展开了对他的迫害。于是作家改变了想法，他担心小说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将不可能在苏联国内发表，所以在写给编委会成员之一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信中，他明确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和不同意见：“我是这样认为的，小说的不可接受性会最终使你们所有人都望而却步。然而，只有不可接受的东西才更应该发表”（Райфман）。最终，发表在文集上的是他的一篇名为《莎士比亚悲剧翻译札记》的文章。可以看出，当时文集的作者们还是竭力避免和官方文学代理人发生冲突的。

苏联官方曾向编者允诺可以出第三辑，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的关于该文集的讨论会上作深刻“检讨”。卡扎凯维奇在1958年6月致苏联作协的信中坚决捍卫自己和编辑部的立场，他写道：“我凭着纯洁的良心，怀着对自己言语深深的责任感……完全摒弃针对我们的所谓小集团主义的指责。是的，我们捍卫过自己对收入该文集作品的观点……直截了当地说，我并未看到任何可以随意指责《文学莫斯科》文集及其编者的理由，我抗议将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标签贴在诚实的苏联作家身上”（Казакевич）。卡扎凯维奇这段话表明了部分严肃作家为追求艺术创作的自由而团结在一起，极力抵制官方的文学教条，坚决维护秉持相同创作理念的作家同仁们。

《文学莫斯科》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实际上第二辑的许多内容也是在二十大之前就已经计划好，只是推迟时间出版而已）便已刊登了长期被官方禁止的作家（比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扎博洛茨基等）的作品，尤其是将这些人中的不属于莫斯科作家圈的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作也收录进去，这进一步展现了文集编者的勇气和魄力，也表明该部文集是作家们试图摆脱官方长期对文学控制的集体尝试。这是一个志同道合、背负相同文学使命感的作家群体。他们的办刊理念就是希望“重新展示好的文学”（Рейфман）。虽然，编者们的捍卫未能改变文集刚出两辑就停刊的命运，作家群体与官方意识形态抗争的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却在苏联文学“解冻”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 3 《塔鲁萨书页》（1961）

《文学莫斯科》被迫停刊以后，曾担任该文集编者之一的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sup>2</sup>甚感痛心，但却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对他来说，“无所作为就如同死亡”（Свирский），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创立新文集的构想一般认为是1958年在雅尔塔的“创作之家”形成的。当时帕乌斯托夫斯基正在此地度假。有一天，同在这里度假的作家们举办了一次文学晚会，当众朗读自己的新作品。这些作品中有许多当场就打动了听众的心，然而却不能通过官方的途径发表。这种现象在当时意识形态挂帅的文学界并不罕见，诗人谢尔文斯基后来在诗中形象地描绘当时作家与政权的这种紧张关系：

“主席似大蟒，  
出版人如乖兔，  
批评家赛过狗熊。  
在苏联想当作家，  
身体不硬朗哪行！”（转引自Свирский）

发生在雅尔塔的这一偶然事件成为了新文集诞生的契机。帕乌斯托夫斯基强烈感觉到“需要突破，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Свирский）。最终，1961年文集《塔鲁萨<sup>3</sup>书页》（《Тарусские страницы》）面世。文集的编委会成员包括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尼·奥腾、弗·科尔勃里科夫、尼·潘琴科、阿·施坦因伯格等，实际由帕乌斯托夫斯基担任主编工作。

有过这方面工作经验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此次汲取了《文学莫斯科》的教训。在作品选择方面，针对文学官僚的心理，此次充分考虑了文集内容和结构的平衡性。既收录了像叶·维诺库罗夫和尤·特利丰诺夫这样基本不与官方冲突的作家的作品，也收录了一些极可能有争议性的作品（比如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中关于布宁和奥列沙的章节）。文集大篇幅选登了茨维塔耶娃的40多首诗歌。为免受非议，帕乌斯托夫斯基专门邀请了有官方背景的作家符·伊万诺夫为诗人的作品作序，此举当然是希望能够冲淡文集的“叛逆”色彩。不仅如此，在文集的行文和排版上编者们也费尽心思，甚至不惜耍一些“滑头”。序言的作者有意模仿“真理报”社论的行文风格，而表现出的政治进步性比起它的被模仿对象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这样的句子：“确立将建设共产主义宏伟计划作为苏共的新纲领展现在人类的面前……”（Свирский）。排版上故意将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用显眼的大号字体刊印，而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文字则全部使用小号字体。整部文集具有强烈的文化氛围，配有大量插图，不仅有各种知名人物肖像，还有伊·列维坦、康·科罗温、米·弗鲁贝尔等著名画家的未知名作品。

《塔鲁萨书页》出版信息中标注的发行量为75000份，后来由于受到苏联官方的行政阻挠，实际发行量为30000份。然而，这也足以在苏联读者中产生不小的影响，甚至在大学生中还出现了时髦词汇“塔鲁萨的年轻人”（Филд），用来特指那些阅读过该文集并受其影响的年轻人。文集的内容十分丰富，可读性强。如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随笔首次将布宁同时以普通人和作家的双重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之后，不读布宁在社会上已经被看作是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另外，《塔鲁萨书页》也成为许多年轻作家初登文坛的阵地。比如布拉特·奥库扎瓦、尤·卡扎科夫、弗·马克西莫夫等，他们后来在文学上的前途和命运充分说明了文集编者对真正的文学慧眼独具。当然，读者们还能读到已具有一定知名度作家的新作，比如著名诗人尼·扎博洛茨基、大卫·萨莫依洛夫、鲍·斯卢茨基、弗·科尔尼洛夫等人的诗歌新作以及作家格拉特科夫关于刚得到平反的梅耶荷德的回忆录。

由于遭到告密，苏共中央委员会亲自介入，通过专门决议禁止文集的继续发行，没收已出版的册数。1961年12月2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事务局召开会议。会议纪要中指出，《卡鲁萨书页》刊登了一些“文学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存在缺陷的作品，这些作品歪曲了苏联农村和苏联人的生活”<sup>4</sup>，正因为其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的问题曾被各家出版社和杂志拒绝刊登。被点名的作品包括尤·卡扎科夫的《面包的香味》等三部短篇、科尔尼洛夫的长诗《司机》、扎博洛茨基的诗歌《行人》、马克西莫夫的中篇小说《我们崇拜大地》、茨维塔耶娃的40多篇“颓废”诗歌等。1962年1月9日苏联作协机关报《文学报》上刊登一篇名为《〈塔鲁萨书页〉文集的诗歌和小说》的文章，作者认为该文集“总体来说是一本有吸引力的智慧之书”（Осетров），但结尾又指出了文集最大的缺陷是反映当代主题的力度不够。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才是代表了苏联文学以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中正视苏联的社会现实，针砭时弊。关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根本不可能涉及到的社会阴暗面和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另一方面，他们不满当时一味粉饰现实的“无冲突论”文学和僵化的文学语言，主张返回到19世纪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文学传统，为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比如，尤·卡扎科夫的这三部短篇小说中作家对大自然的描写非常精彩，表明他对俄罗斯大自然有深入理解。作品的语言清新自然，无论从风格手法上还是艺术水准上都十分接近屠格涅夫。正如卡卢加州《旗》报上的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如果在阅读尤·卡扎科夫的短篇小说时没注意到像‘主席’、‘集体农庄’、‘劳动公分’这样的词汇，那么可能会认为作品描写的是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或……本世纪初的事”（Кучеровский, Карпов）。作家鲍·巴尔杰尔（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学生）在小说《同城的三个年轻人》中十分敏锐、准确地捕捉到了苏联当代青年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特点。美国苏联文学研究专家安德鲁·菲尔德据此认为这篇小说“差不多起到了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对于美国一样的作用”（Филд）。

然而,《塔鲁萨书页》在当时被视为是对苏联审查制度赤裸裸的挑战。因此,无论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亲自给赫鲁晓夫的助手列别杰夫打电话,还是文集的作者们联名致信给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都未能改变文集最终被查封的命运。为防止其他地方出版社效仿“卡卢加书籍出版社”企图绕过官方审查“路障”的做法,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秘密决议:《关于〈卡卢加书籍出版社〉错误的决议》,决议中严厉批评了该出版社和《塔鲁萨书页》文集,并对许多与该文集出版相关的人员作出行政处罚。根据决议内容,“卡卢加书籍出版社”社长斯拉特科夫受到记过处分;主编列维塔因“丧失政治警惕性和党性而出版思想上有害的《塔鲁萨书页》文集”被解职并记过处分;州委书记苏尔加科夫因在《塔鲁萨书页》文集事件中“玩忽职守,对出版社管理不力”(Горяева 2009: 327)也受到行政处分。所幸的是,参与编纂文集的作家和文集的作者们并未遭到官方的进一步政治迫害。他们中的许多年轻作家成了此后苏联文学的生力军(如马克西莫夫、奥库扎瓦、特利丰诺夫等)。

《塔鲁萨书页》是一批苏联作家在《文学莫斯科》被官方取缔之后集体发动的一次旨在冲破苏联官方文学审查壁垒的“反攻”,而在这两部文集中均担任过编委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文集的意义不仅在于形成了“新的文学”和文学语言,而且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官方的教条主义和不能容忍‘异端’的偏执。从而为索尔仁尼琴步入文坛做了准备,营造了有利于索尔仁尼琴的社会氛围”(Свирский),也为后来《大都会》文集的出现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教训。

#### 4 《大都会》(1979)

《塔鲁萨书页》尽管被官方取缔,然而作家们的办刊精神和理念却在苏联社会生根发芽。苏联社会在经历了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对索尔仁尼琴的迫害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不但官方未能实现通过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达到消灭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的目的,而且促成了一直处于地下的“潜流”文学蓬勃发展、暗流涌动,大有呼之欲出、成为主流之势。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文学领域,而是渗入到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最终撼动了整个社会制度的根基。

勃涅日涅夫上台后,实行保守政策,加强了对自由思想的控制,苏联社会发展进入了所谓的“停滞”时期。然而,苏联官方文学并没有停止发展,而是寻求花样翻新和新的突破。当谈论祖国的自由被限制时,作家们转而写自己的故乡;当官方禁止自由议论时弊时,作家们就大写特写历史,写苏联人民自我意识觉醒的卫国战争。在“解冻”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创作了辉煌的“军事题材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这两股创作潮流延续了“解冻”后形成的文学繁荣局面。在诗歌领域,兴起了所谓的“宁静诗歌派”,诗人们不愿局限在官方规定的框架内创作,从而转向对生与死、爱与恨等永恒主题的探索。

非官方文学表现出的求变、创新意识更加强烈。《大都会》就是该时期一批年轻的非官方作家在创作内容和形式上所做的一次文学“实验”。文集的创刊动机与苏联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推土机”展览事件<sup>5</sup>有关。文集主要发起者之一——作家维·叶罗菲耶夫认为,《大都会》应该成为“文学中的‘推土机’展览”(МетрОполь 2001: 5)。他的想法得到了其他四位作家同仁(叶·波波夫、瓦·阿克肖诺夫、安·比托夫、法·伊斯康德尔)的鼎力支持。他们组成编委会并开始向一批出色的、有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作家约稿。到了1979年1月,他们编出了一本近600页(共596页)的文集,收录了包括5位编者在内的23位苏联作者(其中10位为苏联作协成员)和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作品,使该文集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文集的作者由风格各异的作家组成,他们的年龄、职业、知名度和创作才能也千差万别。其中既有列宁格勒的锅炉工,也有西伯利亚的地质学家,还有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的专家。文集刊登有诗歌作品(谢·莱因、谢·利普京、弗·维索茨基、亨·萨普吉尔、尹·利斯尼扬斯卡娅、安·沃兹涅先斯基等)、短篇小说(维·叶罗菲耶夫和叶·波波夫的多部短

篇、贝·阿赫玛杜琳娜的短篇《很多狗和一只狗》、安·比托夫的3部短篇、法·伊斯康德尔两部短篇等)、几部中篇小说(维·特罗斯特尼科夫的《日记选》和鲍·瓦赫京的《皮大衣》等)、阿克肖诺夫的戏剧《四种稟性》和美国作家厄普代克长篇《政变》(The coup)的节选(作家阿克肖诺夫译)。此外还有一些随笔、论文等。这些作品大多并不涉及政治内容,作品的体裁也各式各样,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追求创作自由和创作形式的多样化是文集作者们的共同目标。为此,他们广泛运用了超现实主义、超自然主义、新小说派、视觉诗派、荒诞派等当时被视作“另类”的创作手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开辟了后来被称为俄罗斯“异样”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时代。

《大都会》文集编者的初衷是想以“自发出版物”的形式保持作家和个人的尊严,冲击文学审查制度,表达作家们对创作自由的严正诉求。他们将那些未能通过官方审查的作品结集成书,并完全保留作品的本来面目。文集序言中写道:“只能以现有的形式印刷出版。不得做任何增添与删节。”(МетрОполь 2001: 14)。这是一种宣言。目的就是还原文学的本来面目,用“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文学来扩展当时的苏联文学图景”(Залабани 2006: 244)。文集的名称“大都会”(МетрОполь)一语双关,首先指的是文集的出版地是莫斯科这个大都会(метрополия)。其次,词根中的Метро(地铁)也暗藏深意,在这里,处于地下并迅速发展的“隐性”文学被比喻为莫斯科城下纵横交错的地铁线路,而文集为这些作者们提供了一块虽然简陋,但贵在自由的栖身之所,正如文集序言中写道:

“流离失所之人的理想就是头顶上能有片瓦遮盖。因此《大都会》就是位于世界上最优秀的地铁线路之上的首都窝棚……作者们对自己的作品负责,这种创作的责任感对我们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或许,这种意识的增强会给我们整个文化带来益处。《大都会》产生了对无家可归的文学层面虽无穷无尽,但却十分直观的联想”(МетрОполь 2001: 9)。

正因为文集的名称有这样几层含义,因此封面上的俄文名称将第一个O大写,也是对读者的一种暗示,希望他们能从中揣测编者的匠心。

文集最初的发行量只有12册。为了慎重起见,其中的2册分别立即寄往美国和法国。编者尽量将文集的编辑工作公开化,避免与官方发生更多的冲突。因此,其中的一份文集由编者直接交给了时任莫斯科作协书记的菲·库兹涅佐夫。一开始,官方的确没有过多在意。然而,也许正是这种“公开性”震动了苏联国家机构,认为这是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公然挑衅。当定于1月23日文集的“预展”(即首发式)消息传遍整个莫斯科时,官方似乎如梦初醒,如临大敌,因为首发式上将有外国媒体记者到场。可是时代毕竟不同了,苏共中央委员和克格勃此刻都不希望直接介入此事,责任就落到了苏联作协的肩上。于是,莫斯科作家组织出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编者务必参加于首发式的前一天即1月22日举行的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大都会》文集。会议由菲·库兹涅佐夫主持。讨论的结果,文集被定论为“支持西方反对苏联行动的政治教唆和旨在将‘自发出版物’合法化的企图”(Залабани 2006: 246)。甚至有些与会者认为文集带有“诲淫”的性质,艺术性方面也无可取之处。会议主席威胁要将维·叶罗菲耶夫和叶·波波夫开除出作协。但是5位编者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仅仅答应作一个让步,即同意取消原定的文集首发式。

1月25日,《美国之音》电台称《大都会》文集将于近期在美国由“阿尔季斯”出版社<sup>6</sup>出版,手稿的另一份也已交付给法国的“加利马尔”出版社。苏联官方最不愿看到的情况发生了,文集在国外的出版已经由“危险”变成了铁定的现实。与此同时作协开始对作家采取措施。许多文集的作者被禁止在苏联发表作品。波波夫和叶罗菲耶夫被开除出作协。甚至连部分家人也受到牵连<sup>7</sup>。利普京、利斯尼扬斯卡娅等人主动退出了作协,以示抗议。阿克肖诺夫被迫侨居美国,并于1980年被褫夺苏联国籍。《大都会》事件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1979年8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厄普代克等五位美国著名作家给苏联作家协会的一封信电报,文中呼吁苏联作协恢复两位作家的会籍。另外,欧洲的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地媒体

也发文声援受到迫害的苏联作家。

《大都会》事件表明，苏联的文学审查制度已经处于穷途末路、日薄西山之境<sup>8</sup>。官方采取的反制措施也柔和许多。波波夫和叶罗菲耶夫虽被开除出作协，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二人刚被特批加入苏联作协，还没有拿到作协证<sup>9</sup>。另一方面，这在一开始只是作为一种威胁手段。后来波波夫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作协曾打算尽快恢复两名年轻作家作协成员资格。而且波波夫在被开除以后，仍然继续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要知道当时的所长就是带头向文集发难的菲·库兹涅佐夫。而至于叶罗菲耶夫的父亲受到牵连一事，小叶罗菲耶夫给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此后他的父亲被安排到苏联外交部在莫斯科的中央机关工作。

《大都会》文集直到1991年才与俄罗斯读者见面。之后又被不同的出版社再版过两次，分别为1999和2001年，可见其影响力。文集的编、作者后来大多都成为“新俄罗斯文学”的骨干力量和精英。比如，安·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1978）被公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维·叶罗菲耶夫的《俄罗斯美女》（1990）被誉为“第一部在俄罗斯出版的国际畅销书”，其编著的《俄罗斯恶之花》（1997年）收集了“20世纪末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影响很大；阿克肖诺夫的《伏尔泰男女信徒们》被授予2005的俄罗斯布克奖。苏联的政治文化体制是如何无情和决绝地压制与迫害苏联社会的创造力，由此可见一斑。在像《大都会》文集这样的“自发出版物”前赴后继的冲击下，苏联文学审查制度（甚至连苏联帝国大厦）已经摇摇欲坠，苏联文学逐渐完成由“解冻”到“解放”的过程。

## 5 结束语

以上我们对20世纪后半期苏联出现的《文学莫斯科》等三部文集的命运进行了述评，从中我们不难把握“解冻”后这一时期苏联非官方文学的发展进程以及对官方文学体制的冲击。关于这一点，余一中教授曾这样描述：

“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针对斯大林留下的冰冷僵化的体制呼吁‘解冻’，继而有帕斯捷尔纳克1957年在《日瓦戈医生》中关于尊重和珍视文化、文明的呐喊，接下去更有索尔仁尼琴对古拉格群岛的控诉、布罗茨基的率性吟唱、拉斯普京关于恢复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呼唤，庞大的1960年代作家群对苏联官方霸权话语的疏离与消解……反对苏联官方文学体制的涓涓细流最后汇成了涤荡这一体制，冲决苏联帝国堤坝的巨流”（余一中2008：79）。

同时应当指出，这三部文集在政治观点、审美方法是有所不同的。它们之间存在一个不断前进、逐步深化的过程。只是到了《大都会》时才全面从思想与审美等各方面与官方的文学体系分庭抗礼了。

作家群体当然是推动文学“解冻”进程的主要力量，而众多的文学期刊、杂志和文集等则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战斗阵地”。与受到国家审查控制的官方文学期刊、杂志相比，这种“自发出版物”的文学选集具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它们能够快速、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新变化，并及时反映到文学中，最终借助文集的传播走向读者，产生社会效应。《文学莫斯科》等三部文集的创作与结集过程还颠覆了斯大林规定的苏联统一作家协会的理念，使共同的政治、社会、审美、情趣等等应当成为作家们自由结合的基础这一思想日渐深入作家们的心灵，这一思想也为日后的，即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学团体、文学杂志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三部文集是苏联文学“解冻”之路上的三座里程碑。它们的命运向我们诉说了这条道路的艰辛，展示了作家们不畏强权、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良知，促进了自“解冻”以来“俄罗斯社会意识的解放”（Чупринин 2007：513），成为“新俄罗斯文学”的先驱。

## 附注

1 详见：余一中：“多元——一元——多元——苏联文学 74 年的发展道路”，《外国文学研究》1994 年第 3 期，第 8—13 页。

2 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苏联著名作家，以文笔优美的散文著称，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63 年苏联的一次社会调查表明，帕乌斯托夫斯基是当时苏联拥有读者人数最多的作家，甚至超过了官方认可的苏联“第一作家”肖洛霍夫。

3 塔鲁萨是苏联卡卢加州的一座著名文化名城，距首都莫斯科约 150 公里。很多享誉苏联的作家、画家都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比如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诗人扎波罗夫斯基、茨维塔耶娃等，画家有瓦·波列诺夫和维·鲍里索夫-穆萨托夫等。

4 会议纪要的原文刊登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世界》杂志 1998 年第 10—11 期。详情请访问杂志官网：<http://www.mirpaustowskogo.ru/magazine/mp-11/02-02.htm>

5 上世纪 30—80 年代期间苏联艺术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创作原则是官方唯一认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这一创作原则相左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则很难发表。1974 年 9 月 15 日，20 名苏联“非官方”的艺术家在街头公园举办艺术展，苏联当局动用了推土机和洒水车，有些艺术作品被推土机就地碾压。由于当时有不少外国媒体记者和外交官员在场，因此这一事件造成了国际轰动。后来，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苏联官方被迫做出让步并允许艺术家们举办类似的展览。两星期后成功举办新展，而此次参展的艺术家人数由原来的 20 人上升到 40 多人，并吸引了 1500 多名观众前来参观。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推土机”展览事件。

6 该出版社当时的所有者是卡尔·普罗菲尔，曾出版过数百部在苏联国内遭禁的俄语书籍，其中就包括纳博科夫、布尔加科夫、沃伊诺维奇、伊斯坎德尔等作家的俄语作品，因而在苏联有很大的知名度。为了赶时间，文稿先是以电版翻印的方式出版，后来才出了排版版本。

7 比如，叶罗菲耶夫的父亲老叶罗菲耶夫就受到牵连，当时他正担任苏联常驻维也纳国际机构代表，后被从国外紧急调回，以劝说其子在《文学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明确表示拒绝继续参加编纂《大都会》的工作。最终，小叶罗菲耶夫并没有写这样的信。其父也被迫提前“退休”。

8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实行政治“公开化”起，苏联的政治审查制度逐步趋弱。1990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颁布《出版和其他大众传媒法》，从此，作为苏联最高文学审查机关的苏联文学出版总署（Главлит，1922 年成立）走完了自己的道路，退出历史舞台。1991 年 12 月 27 日，就在苏联解体后两天，俄罗斯联邦颁布《大众传媒法》，直接取消审查制度。

9 当时加入苏联作家协会的条件之一是申请者在提交申请时必须提供至少一本已出版的书籍作为审核申请者是否具备加入该组织资格的依据。而此二人在申请时均未达到这一最低要求。但最后他们仍然被批准加入作协，也许是出于作协章程中关于重点培养和鼓励年轻作家的考虑。

## 参考文献

- [1]Горяева Т.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гг. [M].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 2009.
- [2]Залабани М. Дело «МетрОполь».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J],2006, №82.
- [3]Каверин Н. Несколько случаев из жизни Вениамина Каверина.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J],2002, №5.
- [4]Казакевич Л. Об альманахе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осква», и не только, Мы здесь[E], 2012,№372.  
<http://newswe.com/index.php?go=Pages&in=view&id=5299>
- [5]Кучеровский Н., Карпов Н. Во имя чего и для кого? , Газета «Знамя» (Калуга) [N],23 декабря 1961.
- [6]МетрОполь: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альманах,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Е. Попов, В. Ерофеев и др. [M].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1.
- [7]Осетров Е. Поэзия и проза «Гарусских страниц»,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N], 9 января 1962.
- [8]Райфман П. Глава седьмая. «Оттепель».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ы[E].  
<http://reifman.ru/soviet-postsoviet-tsenzura/glava-7/>
- [9]Свирский Г. О журналах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осква» и «Гарусские страницы» Паустовского [E].



- <<http://paustovskiy.niv.ru/paustovskiy/mesta/tarusa/o-zhurnaloh.htm>>
- [10]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Дилогия Василия Гроссмана. Новый мир [J], 2003(8).
- [11]Филд Э. Тарусские страницы. Мир Паустовского [E], 1998 (11-12). <<http://www.mirpaustovskogo.ru/magazine/mp-11/mp.htm>>
- [12]Чупринин С.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егодня: Жизнь по понятиям [M]. Москва: Время, 2007.
- [13]20 世纪俄罗斯文学.阿格诺索夫主编, 凌建侯等译[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 [14]余一中. 从文学看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从苏联到俄罗斯》读后[J]. 博览群书, 2008(5).

## Three Miscellanies: Three Landmarks in Late 20<sup>th</sup> Century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Yang Zhe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ree literary miscellanies (*Literary Moscow*, *Pages from Tarusa and Metropol*) and their respective destiny, explores the “thaw” of the unofficial Soviet literature from “the underground” to “the ground”, and from “the implicit” to the mainstream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oad is not smooth at all, for various obstacles from national ideology and literary censorship system are to be overcome. The destiny of these three collected works reveal not only the hardness of the road, but also the editors’ and writers’ mighty spirit and courage to defy power and pursue truth. The creation and assembled process of these three miscellanies also overthrow the Stalin’s concept of united Soviet writers association, make the idea, that the common political social points and aesthetic taste should be the basis writer’s free combination, deeply rooted among the writers, and this idea will play a catalytic role in the future, that is, from Postsoviet Russian literary groups, literary magazines to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Many writers whose articles are included in these works have now become outstanding literary figures. Therefore, the three miscellanies represent three landmark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 Russ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Literary Moscow*; *Pages from Tarusa*; *Metropol*; unofficial literature

**作者简介:** 杨正 (1978—), 文学博士,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 当代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学。

**收稿日期:** 2019-03-07

**[责任编辑: 刘 颀]**